

动。胡光世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，他给了我不少革命启蒙帮助，让我从“科学救国”的梦想中逐渐醒悟过来。

1938年后期，胡光世从化学兵部队撤回到清华大学，我们在昆明又重逢了。在西南联大借用的昆华农校大楼前，我和胡光世、李炳国(铁道工程师)三人穿着长衫有一幅合影。

胡光世和我在中学既是同学又是同走读的好友。扬州中学在城西，我和胡光世的家在城东，每天我们都要一道从城东走到城西上学，来回两趟。回来时，我们在城东的最后一站分手，他回花罐街的家，

我回北河巷的吴道台宅第。有时，我还到他家里小憩，听他的堂兄胡宝枢弹古曲，胡宝枢是广陵派传人。三年高中我们相伴，春夏秋冬，从未间断。胡光世在天厨味精厂当老板吴蕴初的秘书，其时胡光世早就是中共党员了。直到解放后，胡光世调北京化工部任部党组成员时，味精厂老板吴蕴初才知道他身边有一个中共地下党员，不免大吃一惊。胡光世一生为党做了许多工作，而生活比较坎坷，有时还比较忧郁，其夫人汪璟因车祸而成植物人，晚年多有不幸，更让我怀念和敬仰。

2010年3月5日于昆明

兼 差

○许仲钧(1948经济)口述
张尚元(1948经济)整理

上世纪40年代初，我考上了西南联大。那年秋天，我只身从滇西漾濞小城到昆明，多年的大学梦实现了，又进了向往已久的民主堡垒，我兴奋极了。

在大西门外新校舍报到后，我立即在校园里四处转悠，还到了文林街。文林街较长，一头接大西门，一头到云南大学，附近文化巷、先生坡、小吉坡、西仓坡、钱局街等街巷密集，一直连着翠湖，住了不少教授和同学。文林街上小餐馆、米线店、冷饮甜食店鳞次栉比，特别是茶馆一家挨着一家，是同学们课余活动的地方，有的看书，有的写东西，有的谈天说地打桥牌，十分热闹。

联大是不收学费的，战区来的流亡学生还可以申请助学贷款。但是物价天天上涨，助学金很难养活学生，但我初来乍到人生地疏，到哪去找一份工作呢？心里也有些着急。

当时同学们半工半读很普遍，干工作叫兼差。好一点的工作是在中小学兼课，或给当地人当家庭教师，也有的在美国空军机场仓库当个雇员，或者在工厂商店值夜班、当店员，士、农、工、商、兵、学各界都有。其时昆明还较落后，每天中午在城中心五华山上放午炮，表示12点，晌午了。这个放午炮的差事，也是联大同学兼的差。

我正在文林街上徘徊，忽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我，回头一看，那不是师兄吗？他还是那个样子，身上罩着那件发白的黑皮夹克，宽味帆布裤子，只是那双力士球鞋换了双旧的美军短统大头皮鞋。

师兄姓陆，江苏常熟人，阳澄湖边长大的，幼年父母双亡，初中毕业后就随叔

□ 联大春秋

叔做生意。抗战之后，他逃难辗转到了内地，先在滇缅路上跟人跑车，当司机助手，后来到公路局做办事员。他为人热情、和善，乐于助人，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师兄。上海沦陷后，我一家也从老家无锡逃到内地，到了四川，我经老乡介绍到滇缅公路局当了一名出纳，此时结识了师兄。同是天涯流落人，师兄待我如亲兄弟一般，我初学算盘就是他教的。

“师兄！你怎么也到昆明来了？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你。”

“我来了几个月了，报上发榜，看到你考上了，是专门来等你的，已在这里转了三天了。”

师兄拉我进了就近的湘江茶社，捡了两个里面靠墙的椅子，要了两碗茶叫我坐下，就关心地问起我的近况。我谈起了当时的处境，师兄沉吟了一阵，最后像下了决心似地说：“这样好了，就到我们皮鞋店兼差，老板虽然十分抠门，到底是同乡人，店里正缺人手，少点工钱嘛。”

我怯懦地说：“有个吃饭的地方就可

以了。”师兄却说：“不，工钱还是要的。”

已经中午12点过了，师兄从内衣口袋里掏出那块亨达利怀表，看看表说：“你饿了吧？”说着拉我进了旁边一家面馆。我第一次品尝了这家同学们称之为“米线大王”的鸡汤米线，师兄也吃了一碗云南特有的卤饵块。

出了面馆，师兄说趁热打铁，今天就带我去店里。我们沿着青石街、正义路、南屏街到了晓东街。当时，云南人多有迟睡早不起的习惯，另一方面由于频繁躲避日本飞机空袭，店铺都是下午三四点钟以后才开门，银行也是上午不营业。

晓东街是南屏街与宝善街之间的一条短短的小巷，是去繁华的金碧路的捷径。又有一家号称西南第一家设备优良、声光兼美、专放美国进口电影的南屏电影院屹立街中，两旁商铺云集，是一条专为美军和富人供应时尚商品和饮食的繁华街道。街南口右拐几步的宝善街上有一家皮鞋店，就是师兄打工的地方了。

铺子一般三四点钟开门，里外都是师兄一人支应，老板四五点或晚上才来一下，查查账又走了。那天老板已经来了，他四十来岁，宽皮大脸，西装穿得胀鼓鼓的，一看就是发了点国难财的暴发户。师兄说过，他跟人跑滇缅路时赚了几文，路不通了才来昆明开店。平时装得很神气，西装革履，上面口袋插两支派克金笔，下面口袋放三本支票簿，其实大字不识几个，支票都是师兄代开的。他好酒贪杯，嗜赌如命，吝啬贪财，不过大小事都要依靠师兄，对师兄还是不错的。

师兄介绍了我的情况以后，看来他十



1948级经济系老同学相聚合影。前排右为许仲钧夫妇，左为戚庆元夫妇，后右1为张尚元学长，左1为陈为汉学长

分满意。但是为了给工钱杀价，却有诉不尽的苦，什么云南制革厂牛皮出厂价格又提了，天天躲警报，生意不好做呀，米价又涨了，作坊里几十号工人天天要吃喝开支大呀，等等。

那时法币天天贬值是事实，师兄也是低工资，店里除了管饭外，一月工资法币12000元，约合一双中等女皮鞋的价钱。我那时年轻不懂事体，听老板一说，十分同情，正想开口说我在读书，需要有个吃住地方，工钱可以不要之类，师兄使劲向我递眼色，叫我不要说话。他向老板说，那就少一点工钱吧，大学生会写会算的，又是同乡人。后来商定，每月给我6000元工资，是师兄的一半，即一只皮鞋钱，还管一顿晚饭。因为下午才开门，晚饭离不开人，因此每天都由作坊，也就是老板的家里派人送饭来店里吃。这样，我就在皮鞋店兼差当伙计了。

二

我的课一般选在上午，在新校舍学生食堂午饭后到店里上班；有时下午有课晚些到店里，师兄就一个人守店了。他总是把晚饭留起，到老虎灶打一瓶开水放在旁边，晚上也总是叫我先到楼上小房间自习读书或整理笔记，他一人看店堂。店里一般是10点钟左右关门，有时要等到南屏电影院末场才打烊，太晚了或遇雨天路滑，我就不回宿舍了，和师兄挤在楼上小屋，或者就在店堂地上铺床草席过夜。好在昆明天气好，不冷不热。

师兄是店里和作坊唯一的先生，看店，进货，跑街，上银行，记账，收账，杂七杂八的事情多得很，他总把杂务都尽

量挪在上午办好，午后和晚上同我一起看店，教我应对顾客做生意。

不久，我就能独当一面卖鞋了，但师兄还是不放心，外面的事一办完就赶回来帮我。他常说，我们这些人墨水喝少了，处处吃亏；你是读书材料，要为我们这些同乡人争口气。他晚上总是早早赶我上楼学习。

星期天，南屏电影院有早场，票价便宜一半，他知道我喜欢音乐，凡是有音乐片，他一定一早去排队买票，如肖邦的《一曲难忘》、小施特劳斯的《翠堤春晓》、舒伯特的《葡萄春满》等音乐片，都是我们一起看的。其实师兄也是非常渴望知识，向往大学生活的，他喜欢历史，跟我去听过几次孙毓棠教授的《中国通史》。

有一天，师兄吃过晚饭出去办事了，我一个人守店。进来了一男一女两位顾客，男的敞开衬衣口，披件西装上衣，脚上一双长统皮靴，马刺铮亮，一看是个穿便装的军人。他挽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，一目了然是个吉普女郎。昆明人把陪伴美军和军官商贾吃喝玩乐、不三不四的女人称为吉普女郎，因为她们常被载在吉普车上招摇过市。那女人进门后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把脚一翘，对我努努嘴说：“喂，把那双乳黄色高跟鞋给我穿上！”我心里十分不乐意，可是师兄又不在，我只好顺从地答应着，从货柜里取出皮鞋给她穿上，大小正合适。

她问：“多少钱？”“两万元。”我答到。

“啥子？两万块！你们奸商只想赚钱，太贵了，少点！”军人抢说着。

□ 联大春秋

老板交代过，喊价比售价一般高一到两成。“要吗？可以少点，一万八好了。”

“还要少！”男女二人一起喊。我只好亮出底牌：“卖价一万六！”

“一减就是四千块，可见你们赚好多呀，还要少！”

“不能再少了，老板交代过的，少收了钱，会说我们贪污，要我们赔的。”当时我一个人在店里，又少经验，不会讲价，面对这样的买主，有点招架不住了，只好说出苦衷。

只听“唰”的一声，那军人一下子掏出一把左轮手枪，对准我胸口：“还要少！不少不行！一万块，卖不卖？”

我没见过这样的场面，有点害怕，但也有点火了，这不是光天化日下明火执仗地抢吗？忍不住脱口而出：“不要钱也可以！”

那军人喝得醉熏熏的，没有想到一个毛头小伙子敢公然顶撞他，而且当着女人的面。他把手枪一挥跳了起来，脸红脖子粗，吼道：“好呀，你瞧不起我们，今天我们就是要你的，不给钱又咋个？我是警备司令部的，我姓熊，你认到我！”边说边把左轮手枪在我脸上晃来晃去。

这时候，店门口围满了人，隔壁帽子铺的老伙计赶来打圆场。这时师兄也回来了，那军人甩了一万元法币在柜台上，提着手枪对门外围观的人群大吼一声：“让开，让开！不关你们的事！”悻悻地迈出大门，扬长而去。我这时真想哭，却又哭不出来。

晚上老板回来，一听卖了双高跟鞋才收了一万元，登时火冒三丈：“那个经的

手？”师兄抢先一步说是他，我也忙说是我。老板说：“反正是你们两个！是不是你们的熟人，做了人情？就该你们赔！”

师兄把当时情形一五一十地细说了，最后又补了一句说，那拿走皮鞋的姓熊，说是警备司令部的。老板一下子眼神温和了，黑起的脸也亮了：“什么，警备司令部，姓熊的？你们又何必收钱呢，这么傻，他们是请都请不来的……”老实巴交的师兄和老板处得久，知道他的心意，还有潜台词没有说出来：以后仰仗人家的还多呢。我在一边暗想，真是奸商，要是我们真把皮鞋送了人，他又该怎么说呢？原以为这下问题解决了，可是老板却坐上收银台，扒拉了几下算盘，貌似宽容地说：

“这回算了，你们赔六千元就是了，一人三千，一个月一千，三个月赔清。”

三

那一天，空袭警报一直到下午5点才解除，我回到店里时，看见大门紧闭。我有一把钥匙，但一个人不敢开门，怕又遇上上上门滋事的不速之客，连忙到不远的如意巷老板家里找师兄。老板家是个小院，老板住在左边厢房，正屋三间打通是皮鞋作坊，平常有一二十个工人进进出出，忙忙碌碌，今天作坊里却鸦雀无声。

果然出事了，工人们都走开了，只见师兄躺在地上呻吟，衣服被撕破了，嘴角上还在流血。看我进门，他挣扎着想从地上爬起来：“你回来了啊，我们开店去吧。”我连忙轻轻地扶他起来坐下，问他怎么回事。师兄说：“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，我也是跑警报才回来，刚进大门，作坊里跑出来几个人，抓到我就一顿打。还

问你们老板躲到哪里去了？”那人还说：

“你们老板欠了赌债，赢了钱就想跑，躲得到吗？告诉你，我们是三公子家的，叫你们老板马上拿钱来，不然我们天天来，打你个稀巴烂！”

一会儿老板回来了，我把情况告诉了他，又说“你在外头欠赌帐，人家来把师兄打了，师兄牙被打掉了，衣服也破了，都说要你送医院赔钱。”

“我赔钱，赔个火钳！遇到三公子的人你们就该躲远点呀！店里早该开门了，你们还不快去？”师兄只顾向我摆手，叫我忍了，我只好扶起他一拐一拐地回店去了。

四

师兄家里早没亲人了，就当我是唯一的亲人，总希望我比他好，说我肯上进能成器，总是费心尽力想方设法帮助我，说一定要帮助我读出来。两个人都存不起钱，物价天天飞涨，怎么办？看见老板去赌钱，听说时常赢钱，于是师兄也去赌钱了。

第一天赌钱果然赢了，晚上回来非常高兴，对我说：“你看，不是赢了吗？走，请你吃宵夜，三六九大排骨面，营养营养！”“三六九”是晓东街上著名的上海馆子，大排骨面是他们的招牌面，一大块炸酥的猪排，黄滴滴油露露，热气腾腾覆盖在大品碗上，叫人垂涎欲滴。那天吃了排骨面，师兄还要了一壶白干、卤鸡翅、花生米之类下酒。师兄笑着说：“改天赢了请你吃得月楼汽锅鸡！”那可是云南第一名馆第一菜啊，好比北京全聚德烤鸭一样，名闻四方。

可是好景不长，他接连几天都输了。

星期天晚上他又要去赌，挡也挡不住，他说要翻稍，把本钱捞回来就不赌了。我只好把积攒的几百块现金也凑给他。这些天师兄晚上出去，我也未回学校睡，一个人守店，关门后就到楼上读书等他。

一天深更半夜，忽然听见邻居帽子店伙计在喊：“师兄，师兄，你们店门咋个没关啊？”我连忙起来一看，糟了，店门大开，货柜上几排皮鞋都没有了，玻璃柜台的锁也被撬开了，皮鞋被偷了一多半！师兄两点多钟才回来，知道被偷也惊呆了。

第二天一早老板来了，像吃了炸药一样破口大骂：“死猪呀，睡死了呀，我几千万的家当呀，败在你们手上了！给我赔，全部赔！”我徐徐地说：“只有等我毕业工作后，有了钱才赔得起啊。”

“废话！你才进大学呢，赔不起也要赔！我要报官，送你们到警司坐班房！是不是你们串通起引贼上门的呢？”

帽子店老伙计以及左邻右舍也来说好话，建议说，以后师兄和我两个只管饭，不领工钱，以工抵赔……老板还未开腔，师兄坚决不同意，说责任在他，他是守店的，他一人承担。后来，老板对师兄的经济能力也知根知底，又离不开他，师兄把他唯一的一套出客西装卖了，叔叔留下的怀表也当了，赔了一些现钱，又立了字据保证以后如何如何赔偿等等。

我们暂时留在店里，以后老板斯文也不装了，天天骂骂咧咧，真叫人受不了。师兄难过我受气，叫我不干了托故离开，他一个人留下来。正好有同学介绍去当家庭教师，我便和师兄分手了。

2011年4月